

宋元《水浒》故事与《水浒》

——试论《水浒》的忠君思想

潘 运 告

《水浒》是在宋元《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成书的。《水浒》的忠君思想,有着作者施耐庵概括现实生活的一面,也有着来源于宋元《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的一面。

“四人帮”抓住《水浒》的忠君思想,全面否定《水浒》,说《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坏书”,同时,对宋元《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也展开了大讨伐。我们有些同志的文章,在肯定《水浒》之余,对《水浒》连带宋元《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也跟着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批判一番。好象只要是忠君,就属于封建性的糟粕,不批一批就过不去。这实际上是一种左的思想在古典文学评论中的表现。如果历史地具体地考察一下宋元《水浒》故事里忠君思想的历史含义,就会看到,由此而来的《水浒》的忠君思想的主要内容,不但不能否定,而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宋元《水浒》故事,有较为详细的文字资料可考的,几乎都在元初以后,其中主要的有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杂剧中的《水浒》戏。忠君思想,可说是这些《水浒》故事资料的共同的主旨或主题。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考察一下这些《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及其各方面,这样,就会清楚由此而来的《水浒》的忠君思想的含义是什么!

先考察《宋江三十六人赞》①。

这篇文章,就其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和曲折隐晦的表现形式来看,应是写于南宋灭亡后的元初,有人说写于南宋,那是说

不过去的。作者龚圣与在宋景定间为两淮制置司监官,这时他就不可能为“绿林草寇”作赞。入元以后,面对着元朝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潜居深隐,过着贫困的日子,贫困到宾客来访,至无几席。他工诗文、古隶及画,无桌案,常令其子伏榻上,就背上按纸作唐马图,可见贫困到何种地步。只有这时,他才会有反元的爱国思想感情,但又极端地没有言论自由,不能直抒胸臆,只好以借古讽今这种曲折隐晦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所以,《宋江三十六人赞》应是他入元以后的作品。

这篇文章分序言和赞文两部分,序言讲他写这篇文章的经过、目的意义,赞文在宋江三十六人的名字下,各写四句四言诗式的赞语。就序言和赞文联系起来看,是以赞宋江为中心的。文中尚未提“忠义”字样,但忠义思想却明确而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对宋江的赞语是:

不假称王,而呼保义。

岂若狂卓,专犯忌讳。

在这里,作者看来是在赞宋江的“义”,实则强调的是宋江的“忠”,即“不假称王”,并且与那称王的“狂卓”进行对比,使宋江的“忠”显得更突出。这里的“狂卓”,指的是方腊。在序言里引用了《侯蒙传》一段“制贼之计”的话,说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有过人,侯蒙便向宋徽宗建议:对宋江“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联系这段引语,“狂卓”指

方腊是很清楚的。这样把宋江同方腊对比，又引这段“制贼之计”的话，宋江讨方腊的意思也就有了。

在序言里，作者还把宋江同柳盗跖并提，又同“世之乱臣贼子”进行对比。序言说：

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柳盗跖是春秋末奴隶起义的领袖，相传他率领九千义军，所到之处，奴隶主无不闻风丧胆，真是“大国入城，小国入堡”，给了奴隶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荀子誉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龚圣与把宋江同这位奴隶起义领袖并提，足见他对宋江的评价是很高的。不过，他是从忠君的角度来评价柳盗跖的，所以说宋江同柳盗跖一样，坚持行义而不称王，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象那“世之乱臣贼子”，祸国殃民。“世之乱臣贼子”指谁，没有明说，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似指贾似道而言。“四人帮”评《水浒》时，有人说这是指方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乱臣贼子”，顾名思义，指的是朝廷内作乱的臣子，由于在朝廷内作乱，所以才名为臣子，实则贼子。方腊在龚圣与看来，只不过一绿林称王的“狂卓”，怎会说他是“乱臣贼子”？贾似道，南宋末权臣，一个极端反动腐朽的人物。他面对元兵南侵，先是欺君割地赔款以求和，后又望风而逃，只顾保命，南宋的灭亡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他的罪恶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等语，可能就是指他这一丑恶历史。作者在这里，高扬起了对宋江的热情赞颂和对贾似道一类“世之乱臣贼子”的无比愤懑。

作者为什么这样赞扬宋江的“忠”呢？在序言里，作者说他少壮时，就很敬慕宋江的

为人，欲想为之作画赞，因未见史书上有记载宋江的事实，未敢轻易动笔；后来见到《侯蒙传》上那段“制贼之计”的话，知道宋江当时是很有名的，他这才对宋江“三十六人，人为一赞”。目的呢？“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原来他看到宋江的基本精神有发生变异的趋向，必须使之归于正道，其义其勇，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只是如何地归于正道，更好地发挥作用？作者没有明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明说。元统治者规定：凡妄撰词曲，意图犯上恶言者处死刑；凡妄撰词曲讥议他人者处流刑。这样，作者怎敢明说？不过，在小李广花荣名下，有一句“中心慕汉”的赞语，透露了诗人的“忠厚之心”。“中心慕汉”者，身在元时心慕汉室之谓也。这是《宋江三十六人赞》的主旨，也是作者赞宋江的主旨。

这一点，同龚圣与差不多同时期的人周密，把这篇文章收进他的《癸辛杂识》时写了一段后记，作了一点暗示。后记说：

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

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②

原来龚圣与赞宋江三十六人并作序，目的是希望有如宋江者，象陈胜、吴广及项籍覆秦那样，起而覆元！这就是龚圣与的“深意”。遗憾的是，那么多充当“识者”的写文章批龚圣与不该给《水浒》故事加进忠君思想，却连文章的主旨都未能辨出来。

毫无疑义，龚圣与在这里并非为历史上的宋江写传记，他很清楚《侯蒙传》上那段“制贼之计”的话还未及实行，侯蒙就死去了。他其所以说见此才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他赞宋江“不假称王”，意在提醒人们不要忘宋，以表示对元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历史地看，他这种“忠君”思想，这种“中心慕汉”，不能不与爱国主义联系在

一起。因此，他把宋江同方腊对比作赞，看似贬斥农民起义称王，实则是在赞宋江的忠君爱国；他把宋江同柳盗跖并提，意在说明宋江非同一般打家劫舍的“草寇”，而是瞩目于国家和人民大事的英雄；他把宋江同贾似道一类“乱臣贼子”对立起来，更是为了说明真正危害国家和人民的贼子不是宋江，而是在朝廷作乱的权臣。这就很清楚，龚圣与这种忠君思想，如何影响了施耐庵对《水浒》主题思想的酝酿与构思！可以说，《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水浒》主题思想上的先导。《水浒》的忠君思想及其主要方面：写梁山英雄不同于一般“绿林草寇”，他们身在绿林，心怀忠义；写梁山英雄是“朝廷的忠良”，而高俅、蔡京、童贯、杨戩四贼则是一伙祸乱国家的“奸佞”、“奸邪”、“奸党”；强调梁山英雄“替天行道，保国安民”的“保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保境”，和七十一回宋江的《满江红》词中的“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以及写宋江讨方腊的立意主旨，都是从《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忠君思想演变而来的。

再考察《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很像是说话人的“话本”提纲或缩写，文字粗糙，内容简略，但仍保有说话人的一些口气。就其思想色彩来看，也应是元初的作品。鲁迅先生说：

《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
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
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
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
者，则以抄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③。

这里的“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两句话，对于我们分析《大宋宣和遗事》的思想内容很重要。元人有感于时，借抄撮整理“宋人旧本”，加进自己一些观点，或用自己的一些观点，来抄撮整理“宋人旧本”，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里比龚圣与前进了一大步，已明确

提出了“忠义”，而且是两次：先是通过玄女天书，要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后又通过晁盖临终遗言，要吴加亮“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即《水浒》里的军师智多星吴用；“助行”，就是帮助宋江实行。这里的“忠义”，已明确包含了“殄灭奸邪”和“卫护国家”两方面的意思。

“殄灭奸邪”，当指殄灭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贼而言。因为在《水浒》故事的开头，就谈到宋徽宗：

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
命高俅、杨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
欢作乐。盖宝篆诸宫，起寿山良岳，异花奇兽，
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
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
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

这里写出了童贯、蔡京四贼同徽宗一起，昏庸腐朽，荒淫无度，给人民造成了灾难，从而引起了“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夺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两起大事件。在《水浒》的背景材料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师成开府。自来
唤内侍官为宗臣，是时童贯为太师，领枢密
院，恩同宰相，师成为开府，亦与宰相同职，
每春秋大宴，巍然坐于执政之上，与人立讲劝
酬之礼。且家臣为师傅，于义尤悖。童贯领枢
密，日欲宰相同班；后入内，却换易窄衫，与
群阉为伍。出则为大臣，当体貌之礼；入则为
近侍，执使令之役；古所未见也。

这段话把梁师成、童贯乱法度、露奸邪写出来了。

“卫护国家”，指的是民族斗争。在《水浒》故事的背景材料里还有这样两句话：“五月，童贯兵与辽人战败，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会兵于中康。”这两句话不大引人注目，却很重要，可说是“抄撮者”的微言大意，把民族问题点出来了。

就在这种内乱外患的背景下，展开了杨志卖刀、劫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刘唐

下书、宋江杀惜、玄女庙得天书等一连串《水浒》故事，在故事中两次提出“忠义”。实行这种“忠义”、“殄灭奸邪”和“卫护国家”，指的是对内殄灭童贯、蔡京、高俅、杨戩一类奸邪，对外卫护国家不受侵犯，是很清楚的。

这里的忠君思想，较之龚圣与前进了一大步表现在：龚圣与称作乱的权臣为“乱臣贼子”，这里称“奸邪”，从爱国主义思想主旨上讲，显得更准确；龚圣与对民族问题提出“中心慕汉”，这里提“卫护国家”，也更明朗。《大宋宣和遗事》的抄撮者贬斥方腊，不但说方腊陷睦州后，“僭号，改元永乐”，还说他“放火杀人”，“杀平民二百余万”，并在故事结尾点明“宋江收方腊”。这比龚圣与也进了一步，这样把宋江同方腊对立，不但突出了宋江忠君，还突出了他的爱民。这一些，对《水浒》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大宋宣和遗事》以忠义思想安排情节结构，是《水浒》忠义情节结构的雏型。

但是，《水浒》里的忠君思想，比起《大宋宣和遗事》来，表现得更统一，更完整，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这里一面两次提出“忠义”，强调忠君，故事结尾宋江三十六人还因忠君而接受了朝廷的“招谕”，一面在开头却说宋徽宗同童贯、蔡京四贼“无日不歌欢作乐”，给人民造成了灾难，引起“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夺县”，这就很矛盾。这样的昏君，何从谈“忠”？这不是“官逼民反”，而完全是“君逼民反”了。所以在《水浒》里，便改成以高俅发迹逼走王进为故事的开头，使之与“忠君”相一致。第二，这里宋江三十六人聚义造反，首先是由杨志卖刀的情节开始的。杨志、孙立等十二人，是为宋徽宗“盖宝篆诸宫，起寿山艮岳”而押运花石纲的十二位指使，杨志因等孙立，旅途贫困卖刀而杀了一“恶少后生”，结果充军，孙立等十一人救出杨志，上山落草。这又与宋徽宗直接有关，也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君逼民反”了。所以在《水浒》里也改了，改成晁盖等

八人智取生辰纲作为梁山英雄造反的开端，这样就完全成了“官逼民反”而不与宋徽宗发生直接的关系了，从而使之与“忠君”不相矛盾。第三，这里的宋江为人，很有点象民间《水浒》故事里所讲的“宋之为为人，勇悍狂侠”的性格^④。你看他杀阎婆惜那个勇悍劲头：见阎婆惜同情夫假倚一起，“便一条愤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杀了阎婆惜，囊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添上寻”。后来躲进玄女庙，得了天书，连父亲被官府捉去也顾不得了，立即上了梁山，哪里还有那么些忠孝的考虑？这种“勇悍狂侠”的人物，更多地象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很难跟“忠君”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当他们三十六人强大到“朝廷无其奈何”时，竟会接受朝廷的“招谕”，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第四，这里故事结尾，是“后来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这是一种“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这种结局，就很难揭示忠奸斗争的本质和北宋灭亡的历史真实。既然把宋江三十六人作为一支“殄灭奸邪”、“卫护国家”的强大的忠义力量来塑造，而且强大到“朝廷无其奈何”，那末，童贯一类奸邪就甘心失败吗？为什么宋朝最后终于灭亡了呢？这些都很难得到解释。所以，在《水浒》里又作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改成宋江收方腊后“功成遇害”，以悲剧结局结束全书，从而也就无情地揭露了高俅一类奸佞的罪恶，揭示了北宋灭亡的必然趋势。

《水浒》作这些改变并未违背《大宋宣和遗事》的基本思想，只是改变了它的不一致处，使之更好地以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体现“忠义”的主题，而这“忠义”的主题在《大宋宣和遗事》的《水浒》故事里已经很明显。《大宋宣和遗事》的这种不一致，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涉及到了的，可能来源于抄撮者与“宋人旧本”的不一致。里面的《水浒》故事很明显取材于民间《水浒》故事，我们在前面说民间《水浒》故事里“宋之为为人，勇悍狂侠”

与“忠君”不相符，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考察元人杂剧中的《水浒》戏。

这些《水浒》戏多已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六个^⑤。这些都是元代早期的作品，写的是整个《水浒》故事中一些带插曲性质的片断小故事，因而无法窥其全貌。但在这六个《水浒》戏中，有五个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有两个挂出了“忠义堂”的匾额；在梁山义军的规模上，有五个戏由宋江三十六人，一变而成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喽罗”，这些都更接近了《水浒》。只是这六个戏写的都是行侠结义、除暴安良的事，虽然表现了梁山英雄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表现了《水浒》戏的作者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但却没有“诛奸”和“卫国”方面的内容。那末，这“替天行道”的“忠义”思想，其具体含义是什么？是否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里的忠义思想有了不同的内容？

我们不妨拿出《黑旋风负荆》来作一番分析。

《黑旋风负荆》的故事情节已写进《水浒》，讲的是一个叫宋刚的和一个叫鲁智恩的歹徒，冒充宋江和鲁智深，抢走了开小酒店的老王林的独生女。正好李逵踏青赏游经过这里，听说宋江、鲁智深抢夺民女，气得回梁山就用板斧砍“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辱骂宋江和鲁智深。宋江问清原由之后，便同李逵赌赛，立下军令状：他和鲁智深同李逵一起去找那老王林对认，如果是他们两人抢走了他的独生女，那就让李逵砍他们的头；如果不是，就要砍李逵的头。找老王林对认的结果，当然要砍李逵的头，这样便出现了“负荆请罪”的情节。但宋江并不砍李逵的头，而是要李逵去捉拿那两个抢夺民女的歹徒，夺回老王林的独生女，还要鲁智深去协助干这件事。最后是功成举行庆功宴，作为故事的结尾。作者就这样通过具体生动的情节，表明李逵、宋江等人是保护人民的英雄。那末，“替天行道”与这又有何联系？

在剧情里，作者多次提到“替天行道”。李逵听说宋江、鲁智深抢夺民女，回梁山砍“替天行道”杏黄旗时说：“原来个梁山泊有天无日。就恨不砍倒这一面黄旗！”这时在李逵眼里，由于宋江、鲁智深抢夺民女，梁山泊也成了有天无日的一片黑暗，“替天行道”的旗帜也就成了骗人的假招牌，所以他才恨不得将它砍倒。而当宋江、鲁智深同李逵去到老王林酒店，老王林认清抢女儿的不是这个宋江和鲁智深时，李逵则怪宋江威吓得老王林未敢讲真话，说：“你则合低头就坐来，谁着你睁睛先去瞧？则你个宋公明威势怎生豪，刚一瞧，早将他魂灵吓掉了。这便是你替天行道，则俺那无情板斧肯担饶？”这实际是在说：你宋江口讲替天行道，保护人民，现在却用威吓使老王林不敢讲真话，俺这无情板斧怎肯饶你？这时，李逵还是个铁面无情的审判官，宋江有口难辩。只有当老王林具体讲出抢他女儿的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之后，李逵才显得被动。而宋江很宽宏大量，要他去捉拿那两个歹徒立功。在庆功宴上，宋江说：“宋公明行道替天，众英雄聚义林泉。李山儿拔刀相助，老王林父子团员。”从而揭示了戏的主题，也揭示了“替天行道”的内容：保护人民，使老王林这样无辜的人民得以父女团圆。

以同情和热爱人民作为“替天行道”的“忠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这些《水浒》戏的突出特色。这虽然在《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里也存在，但没有这样表现得强烈而突出。《水浒》戏作者围绕这一点，把梁山义军的规模，由宋江三十六人发展成“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喽罗”，达到足以对抗官军，保护人民的程度。这一些，都直接影响到《水浒》。在《水浒》里其所以出现“忠义堂”和“替天行道”的思想，并且把《大宋宣和遗事》里的“卫护国家”的口号改成“保国安民”或“保境安民”，使“安民”思想成为梁山义军战斗口号的一个重要内容，写那么多

仗义疏财、保护人民的情节，以及把梁山义军写成千军万马，强大无敌，都是直接从这些《水浒》戏发展而来的。

这些《水浒》戏的“替天行道”的“忠义”思想，是保护人民的，又是对抗元朝统治者的。这些《水浒》戏的作者，身处社会最低层，同人民群众一样，备受元朝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他们发展《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里的“忠义”思想，在自己的作品里挂出“忠义堂”的匾额，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让自己笔下的英雄，“舍性命大道上赶官军”^⑥，打击那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的“白衙内”、“杨衙内”，特别是象在《喜赏黄花谷》这个戏里的善良的儒生刘庆甫，受蔡衙内的欺压凌辱根本不提到官府告状，却找到梁山向宋江告状明冤，更是意味深长。这无异于说：天子已不存在，天道已被废弃，人民受苦受难，那就让梁山英雄来奉行“忠义”，“替天行道”吧！正如宋江所说的，“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⑦。所以，当梁山英雄去到人民中时，总是“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公开说出自己是宋江哥哥手下几个头领，声明不是歹徒；而正直善良的人民听了，也就大为惊讶，说你们“不是歹徒，竟是贼的阿公”。“不是歹徒”，即不是一般危害人民的盗寇，“贼的阿公”，即是管贼整贼的祖宗，也就是龚圣与所说的“盗贼之圣”。在《黑旋风负荆》里，李逵就直接称宋江：“你个柳盗跖”。这些《水浒》戏的作者，对于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英雄，是作为对抗官府、保护人民的力量赞颂的。

因此，这些《水浒》戏虽然没有“诛奸”、“卫国”方面的情节内容，而反元思想同样存在，而且比《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表现得更巧妙，也更形象。在《宋江三十六人赞》里，龚圣与只就每个梁山英雄的绰号作文章，尚无故事情节；在《大宋宣和遗事》里有了粗糙的故事情节，又与忠君思想不一致，在这些《水浒》戏里，“替天行道”的“忠

义”思想，则完全是通过戏曲情节和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这些《水浒》戏，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施耐庵为什么把这些《水浒》戏里的“替天行道”、“忠义堂”写进《水浒》的原故。

这就很清楚，《水浒》里的忠君思想的含义是什么！

通过对《宋江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人杂剧中的《水浒》戏的考察，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样几点：第一，从《水浒》故事到《水浒》的忠君思想，真正用艺术形象体现出来，有一个逐渐明确、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都是在元代社会进行的，以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条件的。第二，这些《水浒》故事讲忠君，并非要忠于历史上的那个宋徽宗；宋江、方腊也不是历史上的宋江、方腊，这里只不过寄托着作者的一种思想情绪，就是对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不满和反抗。因此，第三，这些《水浒》故事讲忠君，是跟反元、爱国、爱民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忠君的主要含义，是爱国爱民思想。《水浒》里的忠君思想，虽然不完全等于这些《水浒》故事的忠君思想，在那里有着施耐庵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因而忠君的情节内容更复杂了；但施耐庵面临的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基本历史条件并未变，《水浒》里忠君思想的基本含义与这些《水浒》故事仍然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结论：以宋元《水浒》故事为基础成书的《水浒》，并非象通常所了解的那样，其忠君思想完全是封建性的糟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而是有着积极的含义的，而且这积极的含义还是主要的。

注释：

①② 宋代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

③ 《鲁迅全集》第9卷《宋元之拟话本》。

④ 元、代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陆心源写本，据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转录。

⑤ 这六个《水浒》戏均收在傅惜华、杜颖陶编的《水浒传戏曲集》第1集。

⑥ 《争报恩三虎下山》。

⑦ 《喜赏黄花谷》。